

“红色经典”


HONGSE JINGDIAN

中国传统小说

“红色经典”

叙事模式化的

韩颖琦 著

 人民出版社



中国传统小说叙事模式化的
“红色经典”

ISBN 978-7-01-009655-1



9 787010 096551 >

定价: 26.00元

“红色经典”
HONGSEJINGDIAN

中国传统小说

“红色经典”

叙事模式化的

韩颖琦 著

●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椒元
装帧设计:文 冉
责任校对:高 敏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传统小说叙事模式化的“红色经典”/韩颖琦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4

ISBN 978-7-01-009655-1

I. ①中… II. ①韩… III. ①小说-文学研究-中国-现代
②小说-文学研究-中国-当代 IV. ①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17516 号

中国传统小说叙事模式化的“红色经典”

ZHONGGUO CHUANTONG XIAOSHUO XUSHI
MOSHIHUA DE HONGSE JINGDIAN

韩颖琦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世纪雨田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2011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0.5

字数:240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09655-1 定价:26.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序

韩颖琦的这部著作论述了一个相当重要且很有意义的问题，那就是被称为“红色经典”小说的叙事模式并不“红色”，是中国民间文学和大众文化、通俗文学的政治化表述。从而，得出一个结论：“红色经典”小说是中国的政治话语与中国传统的通俗叙事的结合体。从这样的结论出发，这部学术著作给了我们很多思考。“红色经典”小说是真正中国化的文学作品，其中的政治、社会事件是中国化的，叙事方式和语言特征是中国化的，“红色经典”小说可以说是中国传统小说在新时期的延续；既然是传统小说的延续，为什么又会被一些曾经批评过中国传统小说的新文学作家所推崇呢？显然这些作家的批评标准具有很强的政治意识；中国化的“红色经典”小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曾经创造过巨大的发行神话，这样的成就不仅仅是行政命令的结果，其中确实有独到的美学魅力为中国老百姓所喜欢。这些都是长期困惑于“红色经典”小说研究中的问题，这部学术著作给出了自己的答案，给予我们很多启发。“红色经典”小说的研究在学界并非冷门，著述极多。如果我们将视野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就会发现，对“红色经典”的评价有一个激情式的追捧到情绪化的贬低，再到科学化的评论的过程，韩颖琦的这部著作是当下对“红色经典”小说科学化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

“红色经典”小说是政治化的小说，这一点无可讳言。但是，

2 中国传统小说叙事模式化的“红色经典”

如果仅是从政治化的角度评价“红色经典”小说,其结论一定偏颇。韩颖琦显然注意到这个问题。在论著的《引言》中,她重点强调了她的论述思维:“对‘红色经典’的研究就是要将其放置到‘历史的现场’和‘文学的现场’所共同营造的语境网络中进行,既不抹煞一定历史时期政治对文学的规范和挤压,更将目光投向小说文本内部,试图揭示其文学性之所在。”抹杀“红色经典”小说的政治化特点,不符合实际,要正视这个问题,她的做法是将“红色经典”政治话语引入“历史的现场”,并将历史中的政治话语作为一种文学现象批评之,进入“文学的现场”。“进入现场”就是她的批评思维角度,其核心是学术,即:无论是什么政治话语和文学话语,在这部著作中全部用学术话语思考之,并根据这样的学术思考评判高下、掂量深浅。一部学术著作能够发现问题当然重要,但是,著作中所展现的思维视角更有价值,有了科学的思维视角,自然就能有所发现,这是韩颖琦这部著作有所贡献的根本原因,同时也是最给人启发的地方。

好的学术著作必然有科学合理的学科体系,而要使得学科体系科学合理,宽阔而切合实际的文化视野和富有感悟力的文本阅读必不可少。如果我们仔细研读这部学术著作,将会对此深有感受。韩颖琦显然对中国民间文化、大众文化和西方的主题学有深入的研究。这三大文化体系当然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但是都特别注重对故事元素的分析和对故事传承的研究。选择这三大文化体系给作者提供了很好的分析高度和分析视角。于是作者就能分析出“红色经典”小说的“大众文化气质”,就能分析出“红色经典”小说的情节模式以及“暴力场”、“饮宴场”、“情欲场”、“语言场”等等。论著中的这些分析既充满了文化气息,又新鲜深刻,论述充满着张力。选择适合的文化体系就给文本分析带来新的视角,这

是学者们的共识,问题是怎样选择适合的文化体系呢?韩颖琦没有明说,但是我们却能感受到,与文本感悟性的阅读有很大关系。从这部论著中可以感受到作者对文本的大量阅读,感受到作者对那些文本情节、细节独到的分析,而这些感悟性的文本阅读又促使着韩颖琦对文化的思考和文化批评体系的选择。从感悟性的文本阅读到文化批评体系的选择,再从文化批评体系中加强感悟性阅读的穿透力,这是韩颖琦这部论著形成的路径,并给了我们两点启示,一是只有在细致的文本阅读的感悟中才能有契合的文化批评体系的选择,只有契合的文化批评才能更有效地分析文本;二是学科体系和文本分析的有效融合是在作者多次阅读和理论分析之中形成的。

每一次给学生的著作作序,我都会想到这位学生的特点。韩颖琦给我的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变化。这是韩颖琦的博士论文。博士论文是学术道路上重要的阶段性成果。作为她的导师,我可以说是目睹着她的成长。说实在的,她刚来攻读博士学位时,理论水平和写作水平都不太高。第一次提交的学术报告就受到了批评,可是她具有东北人不服输的性格。时隔半年,面貌大变,再一次提交学术报告就已经很有模样了。其中的甘苦自不用说。博士论文的选题确定之后,她广泛地收集资料,阅读文本,此时交出的学术报告已经有着相当的水平,特别是几篇学术报告被刊物选用发表之后,她的学术能力有了质的飞跃。她有这样的变化,一是很刻苦;二是很有灵性,只要稍微点拨一下,她就能领会,并且进行很到位的修改;三是她特别善于交流,每隔一周进行一次的博士学术报告会上,她都努力发言,并吸取师兄妹们的意见进行修订。学位答辩时,她的博士论文受到答辩委员会的一致好评,被评为优秀论文。工作以后,她对博士论文进行了深入细致的修改,两年以后我

4 中国传统小说叙事模式化的“红色经典”

再看到她这部修改后的论文,不仅论述更为成熟,表述也沉稳了不少,她的学识显然又有了很大的进展。为之,作为导师的我当然更感到高兴。

人生在世,任何一点进展都是要付出代价的,韩颖琦大概也深有感受。在这部著作的后记中作者对很多人表示了感谢,感谢之中有作者的感恩,有作者的欣慰,同样也包含着作者的歉疚。这是韩颖琦的真情流露。作为她的亲友、老师当然更希望她在学术道路上更上一层楼,韩颖琦有这个能力,也有这样的潜力。

此为序。

汤哲声

2010年11月5日于苏州大学北校区教工宿舍

目 录

序	(1)
引 言	(1)
第一章 俗文学视野下的“红色经典”	(11)
第一节 “红色经典”的民间土壤	(11)
一、“民间”理念的流变	(12)
二、民间文学与民间文化形态	(16)
三、对“民间”的利用与整合	(22)
第二节 “红色经典”的通俗文学特征	(26)
一、通俗文学的一般特征	(27)
二、传奇性与趣味性	(32)
三、英雄、儿女和鬼神	(40)
第三节 “红色经典”的大众文化气质	(42)
一、什么是大众文化	(42)
二、“红色经典”影视剧改编现象	(47)
三、娱乐性与狂欢化	(51)
第四节 “红色经典”的工农兵方向	(59)
一、《讲话》的核心理念	(59)
二、“为谁改”与“为何改”	(62)

2 中国传统小说叙事模式化的“红色经典”

三、先是“战士”、后是“作家”	(66)
第二章 “红色经典”的情节模式	(78)
第一节 数字“三”模式	(78)
一、重视数字的文学传统	(78)
二、“三打”、“三大”与“三部曲”	(84)
三、“老少三代”、“一女三男”及其他	(89)
第二节 逼上梁山与两军对垒模式	(92)
一、逼上梁山:出走与回归	(92)
二、两军对垒:诱敌深入与以少胜多	(100)
第三节 复仇模式	(114)
一、复仇的文学传统	(114)
二、家仇与国恨	(121)
三、复仇的“红色经典”化	(128)
第四节 成长模式	(135)
一、由农民到战士	(135)
二、知识分子的蜕变与重生	(143)
三、由战士到英雄	(152)
第三章 “红色经典”的人物模式	(159)
第一节 英雄母题	(159)
一、感生与异貌	(160)
二、磨难与考验	(165)
三、成功与死亡	(172)
第二节 群体化模式	(180)
一、群体化模式塑造传统	(180)
二、共性与个性	(186)

三、“红色经典”英雄无惧无惑无泪	(192)
第三节 脸谱化模式	(197)
一、作为“他者”的反面人物	(198)
二、扁形人物与丑角	(208)
三、中间人物灰色中的亮点	(214)
第四节 忠奸对立模式	(220)
一、可圈可点的叛徒	(221)
二、叛徒阶级属性分析	(224)
三、从大节、小节看忠奸	(228)
第四章 “红色经典”的场景设置	(237)
第一节 暴力场	(237)
一、暴力美学传统	(237)
二、战场与批斗场	(245)
三、监狱与刑场	(251)
第二节 饮宴场	(257)
一、饮食文化传统	(257)
二、传统小说的饮宴描写	(259)
三、“红色经典”饮宴场	(264)
第三节 情欲场	(270)
一、情欲描写传统	(271)
二、正面人物:情欲描写欲说还羞	(277)
三、小人物/反面人物:情欲描写恣意泛滥	(281)
第四节 语言场	(286)
一、标语、口号、演说与遗书、情书	(286)
二、新中国话语权的确立	(291)

4 中国传统小说叙事模式化的“红色经典”

三、粗言俗语的狂欢	(295)
结 语	(306)
主要参考文献	(312)
后 记	(319)

引 言

“红色经典”是一个约定俗成的称谓,指的是新中国成立前后以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历史和建国初期以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为题材的、在当时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一批“革命历史小说”,主要包括文学史上所谓的“三红一创,青山保林”,即《红日》(吴强,1954年)、《红旗谱》(梁斌,1957年)、《红岩》(罗广斌、杨益言,1961年)、《创业史》第一部(柳青,1960年)、《青春之歌》(杨沫,1958年)、《山乡巨变》(周立波,1960年)、《保卫延安》(杜鹏程,1954年)、《林海雪原》(曲波,1957年);还有发表于新中国成立前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1948年)和《暴风骤雨》(周立波,1948年);以及这一时期其他一些影响较大的长篇小说,如《吕梁英雄传》(马烽、西戎,1949年1月)、《新儿女英雄传》(袁静、孔厥,1949年8月)、《风云初记》(孙犁,1951年)、《铁道游击队》(知侠,1954年)、《野火春风斗古城》(李英儒,1958年)、《烈火金刚》(刘流,1958年)、《敌后武工队》(冯志,1958年)、《苦菜花》(冯德英,1958年)和《平原枪声》(李晓明、韩安庆,1959年)等。

“红色经典”研究至今经历了三个阶段。1949年建国前后到1978年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确立的“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原则指导下,文学失去了自己独立存在的地位。1956年“双

2 中国传统小说叙事模式化的“红色经典”

百”方针提出后,文坛上曾出现过短暂的“早春天气”。^① 文革期间,“红色经典”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几乎全方位的否定,在文革结束后的两年时间里,一切都在重建之中,此前失序的状态仍然惯性地持续着。总的来说,第一阶段的“红色经典”研究基本上是以政治视角看文学,忽视“红色经典”的文学性研究。1978年到1988年为第二阶段。这一阶段随着文革后文学创作和批评的渐趋复苏,对“红色经典”的政治性概括有所抑制,然而在思维惯性和文革创伤等因素影响下,“红色经典”研究仍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浓厚的情绪化色彩,多数评论以人性的缺失为由,对“红色经典”几乎给予全盘否定,盲目炮轰的后果自然是客观立场和理性思考的缺失。在从1988年至今的第三个研究阶段中,在“重写文学史”^②的影响下,“红色经典”重又进入一个热评阶段,以文本为中心的“再解读”^③运动也借此契机开展起来,如李扬的《抗争宿命之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42—1976)研究》与《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黄子平的《“灰阑”中的叙述》等论著,都提出了有价值的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可以说,这一阶段的“红色经典”研

① 费孝通语,见《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人民日报》1957年3月24日。

② 1988年4月,王晓明和陈思和在《上海文论》开辟“重写文学史”专栏,讨论当代文学能不能写史和如何写史的问题,“红色经典”研究再一次受到关注,“红色经典”具有文学史意义的看法已经得到广泛认同,从此“红色经典”的文学史地位得以确立。

③ “再解读”运动由海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发起,标志是1993年唐小兵主编的《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现在“再解读”已经成为一个专门术语,指20世纪90年代的一种文学批评活动或者研究思路,它以经典重读为主要研究内容,其特点是借鉴国外理论,重新解读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现象和经典文本,呈现文本的修辞策略、叙事结构、内在的文化逻辑、差异性的冲突内容或特定的意识形态内涵在文本中的实践方式等。“再解读”以独特的视角、新锐的思维和灵活的方法,给其时的文学评论界带来了不小的影响。

究进入了一个相当繁荣的时期,出现了一些颇有影响的专著,如丁帆和王世诚合著的《十七年文学:“人”与“自我”的失落》、蓝爱国的《解构十七年》以及董之林的《追忆燃情岁月:五十年代小说艺术类型论》和《旧梦新知:“十七”年小说论稿》等。虽然第三阶段的这些研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前两个研究阶段出现的政治上“戴高帽”或“扣帽子”的做法,“红色经典”研究也渐趋客观和理性,但要说“红色经典”研究已经进入了客观公正的文学批评轨道,恐怕还为时尚早,因为我们看到,“红色经典”研究本身还存留有以往评论一边倒的印记。虽然在当下的“红色经典”批评中已经几乎不再使用阶级名词和革命术语,^①也少见口号宣传式的或褒或贬的扣帽子做法,^②不过以“人”与“自我”的失落为由对“红色经典”进行全面批判的做法,或者在局部范围内认可其民间的价值和意义,而对其命名的合理性不予承认等做法,说到底仍然是

① 如《暴风骤雨》小说正文前的“出版说明”中指出:遵照毛主席“出版适合农民需要的通俗读物和书籍”的教导,我们从全国近期出版的图书中,选拔出一批适合农村需要的读物,作为“农村版图书”出版,向全国农村推广发行。“农村版”图书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引,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根据党的政治任务、农村各项方针政策和三大革命运动的实际需要进行选编。

② 如冯雪峰在1954年7月18日所作的《论〈保卫延安〉》中开篇就说,“杜鹏程作的长篇小说《保卫延安》的出版,从我们文学工作上说或从人民的文艺生活上说,都是有重要意义的。读者们也许不大注意这样的作品在我国今天文学的成长上反映了什么意义和问题,但每一个读者打开这本书,只要读下去,他就会觉得它的迫人的鼓舞力量,会很自然地振奋和紧张起来,会引起好像不是在欣赏艺术作品,而是被引到紧张的实际的战斗生活中去了似的心情来。读者对于这书所描写的英雄们,也一定会强烈地引起像书中陈兴允旅长说过的那种意识和感情来,觉得受到深刻的感化和教育。……”显然地,评论的重点不在文学作品本身,而更关注其教育意义。

“元叙述”^①思维下的产物,只是变换了一种说法而已,而这种说法最大的弊病就是偏离了文学的本质。

笔者很赞同罗曼·雅各布森曾经提出的一个观点,“文学研究的主题不是作为总体的文学,而是文学性,亦即使特定的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②对于文学的本质,即文学的“文学性”^③是什么的问题,不同的理论家曾给出不同的解答。一批理论家倾向于认为,文学是独立的、纯粹的,具有某种固定不变的本质,文学研究的任务就是找到这个文学之为文学的“文学性”,即“普遍主义说”;另一批文学理论家则认为上述主张更像是一种“学术神话”,他们认为,文学理论必须尾随文学回到历史语境之中,分析历史如何为文学定位,文学又如何改变历史,即“历史主义说”。^④对于文

① 董之林在对赵树理小说的研究中曾表达过对这种“元叙述”的不信任:“可悲的是,建立在启蒙话语基础上的元叙述,具有比以往任何时期的批判都难以企及的摧毁力量,甚至把这一时期(这一时期指“十七年”,笔者注)的文学逐出了文学史讲堂。在形而上的哲学意义上说,这是现代性在‘全人类’的名义下,不同于以往‘阶级’革命的另一种粗暴,另一种粗糙。”董文对十七年文学的文学史地位是否能够确保表示了担忧,对此笔者持相对乐观的态度,理由已在前述中论及,不再重复。不过笔者认同其“另一种粗暴”的观点,并且进一步认为,这种倾向不仅出现在赵树理研究中,而且比较普遍地出现在“红色经典”研究中。参见董之林:《关于“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历史反思——以赵树理小说为例》,吴秀明主编:《十七年文学历史评价与人文阐释》,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23页。

② 转引自[英]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瞿铁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60页。

③ “文学性”是罗曼·雅格布森于1921年提出的文学命题,后成为俄罗斯形式主义学派的核心理论之一。“文学性”指的是文学文本有别于其他文本的独特的本质特征,这种独特的本质特征就蕴含在文学作品的语言层面,并通过对日常语言进行“有系统的破坏”来实现的。

④ 南帆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99个词》,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76—79页。

学理论关于文学性的“普遍主义”与“历史主义”的纷争这里不做深入探究,笔者倾向于这样一种认识,那就是对一部文学作品、对一种文学现象所作出的任何评论,自然应该回到其历史现场,不过文学之所以为文学,更在于其文学性而非历史性和社会性,因此,在回到“历史的现场”的同时,更应将其纳入到“文学的现场”中,否则离开了文学的本质又何谈其附着于本质之上的文学的历史与功用等问题。雷·韦勒克和奥·沃伦将文学研究分为“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并在他们的《文学理论》中分别给予了详尽的理论阐释,在他们看来,文学的背景、文学的环境等因素是文学的外在因素,文学的“外部研究”是根据产生文学作品的社会背景和它的前身去解释文学,也就是前述所说的回到“历史的现场”的研究方法。对于这种研究方法,他们指出,“所有的历史、所有环境上的因素,对形成一件艺术作品可以说都有作用”,“文学作品产生于某些条件下,没有人能否认适当认识这些条件有助于理解文学作品;这种研究法在作品释义上的价值,似乎是无可置疑的。但是,研究起因显然绝不可能解决对文学艺术作品这一对象的描述、分析和评价等问题。”^①因此,对文学进行“内部研究”就显得更加必要和重要,因为“文学研究的合情合理的出发点是解释和分析作品本身。无论怎么说,毕竟只有作品能够判断我们对作家的生平、社会环境及其文学创作的全过程所产生的兴趣是否正确。”^②文学的“内部研究”也即回到“文学的现场”的研究。对“红色经

① 参见[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73页。

② 参见[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55页。